

汉德克《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的语言批判主题

徐建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作为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作品“用语言的独创性探索了人类经验的边界和特殊性”。这位奥地利当代作家曾在早期“说话剧”中高度关注语言批判主题,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创作开始围绕日常这一轴心展开。长篇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可被视为汉德克诗学转折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反侦探小说的创作中,汉德克展演了言说主体在日常背景下行动与感受的被动状态:作为现代漫游者的主人公试图以冒险行动逃离城市、寻找自我身份,却无法与他人达成言语交流,最终他逐渐意识到,凌驾于日常之上的逻辑语言真理观与无个性的语言流通导致了沟通的必然失败。一方面日常在此构成批评对象,另一方面建筑等日常事务则成为对逻辑语言的隐喻;而相比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对于语言交流功用的强调,汉德克对语言的反思意识具有更丰富深刻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汉德克;语言主题;日常生活;交流;维特根斯坦

中图分类号:I52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6-0019-06

0 引言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社会历史宏观进程的重视不同,在20世纪以来的人文科学领域,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及其在日常中的主观感受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这与胡塞尔“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思潮密不可分,日常生活不再仅仅是研究对象“未受质询的基础”(unbefragter Boden),以社会学与民族人类学学者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研究者纷纷以理论或实证方式,共同聚焦于人在社会生活史中的客体性(objektartig)领域。这一趋势在现代文学中也愈发明晰:文学中的日常(Alltag)不再仅仅被解读为对于特定日常情境的现实主义式复现和批判,而更多地体现在人的拯救,即将个体从遗忘此在的、俗众化和物化的日常性(Alltäglichkeit)之“围城”中解救出来(Jung, 1994: 49),对日常主题的关注和反思特别显著地体现在以表现主义、存在主义为代表的创作流派中。

在奥地利当代作家彼得·汉德克(1942—)笔下,创作主题和母题始终围绕“日常”这一轴心展开。尽管在早期作品中自视为“象牙塔里一居民”,否定以文学书写跟从社会现实的可能性,但汉德克的立场绝非从现实问题中退避,而是试图以文学隐喻映射现实问题,作为主体的人的行动与意识占据文本的阐释中心。在出版于1970年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以下简称《守门员》)中,主体的生存问题在普遍的日常处境中凸显,公共领域内的人通过语言交际来关联彼此,而日常交流中的双方也被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所摆布,逻辑语言僵化的结构致使主体间不可能实现达成沟通,这在情节中体现为主人公追寻意义无能同时自身无法被追踪的存在。

梳理对该文本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现实/语言问题以及精神分裂症问题是学界关注的两个突出主题,对卡夫卡的接受和文本符号学解读也有涉及,而国内研究者则对人的存在异化这一主题较为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新主体性”(neue Subjektivität)思潮影响的汉德克踏出喧哗的先锋剧场,从激烈纯粹的言语批判步入自我反思与表达的创作实践,日常事务取代了高度抽象的戏剧陈设成为情节背景。那么,作为汉德克创作中的普遍主题,语言危机如何在呈现在主体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日耳曼学学者马库斯·巴特

收稿日期:2020-07-16

作者简介:徐建华,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语文学与文化学研究。

在《日常中的生活艺术》中指出,即使在探讨形而上的语言思考时,日常也不能被仅仅看作无历史、无时间性的无际范畴(Barth,1998:7),对作品中隐喻符号的解读必须建立在理解日常背景的基础之上。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可被视为汉德克诗学转型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语言危机意识开始呈现在主体的感知和体验之中。因此,本文从贯穿全文的日常主题出发,首先解读作为现代城市漫游者的人物形象,随后在悬置日常背景的基础上,分析语言的效用和真值意义如何在文本中受到质疑:作为人工逻辑体系的语言渗透进日常的各个角落;如此规则都由“求真”这一语言逻辑要求所先行决定的。在这种双重他绝的情境下,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人无论历经怎样的时空转换,都不可能实现真实可靠的存在(authentische Existenz)。

1 逃离日常:现代漫游者的失败冒险

漫游者(Reisende)是现代文学,尤其是大城市文学的重要人物形象之一。相比于古典主义时期修养小说的主人公在游历中接受教育、建构市民身份,或是浪漫派以之追寻诗学理想的创作模式,20世纪以来文学漫游者经历的更多是城市背景下的强烈感知变迁,里尔克《布里格手记》第一部、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和罗伯特·瓦尔泽《雅考伯·冯·贡腾》皆是漫游主题在德语文学中的典型代表(李明明,2007:77-78)。这类作品通常情节破碎,读者随人物视角不断游弋,文本文学性更多蕴含在个体化体验而非线性叙事进程中。《守门员》中的场景从大城市转换到乡村,人物的日常体验总体上由现代生活元素糅合而成,为此本文首先将作为日常主体的主人公的行动解读为现代“漫游者”的冒险尝试与失败。

汉德克在作品中尝试展演现代人受压抑的存在境况,近乎“等待被裁决”的恐惧、焦虑乃至绝望成为他笔下人物的典型心理状态,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其对卡夫卡作品的接受,《守门员》也带有卡夫卡的显著印痕:约瑟夫·布洛赫的姓和名分别来自《商人》和《诉讼》,他回忆中的比赛地是遥远的美国,等等,文本开头自认被解雇的主人公令人联想起变形后被解雇的萨姆萨——其工作旅行推销员(“Samsa war Reisender”)与“旅行者”一词相同,突兀的插入语暗示了他从现代职业秩序中脱离的变异。失去工作布洛赫在维也纳开启游荡之旅,相比于被钟表时间(Urzeit)束缚的职员萨姆萨,他并未受困于现代的线性时间规划,然而与波德莱尔笔下追逐商品神秘之美、匿名遁入人群的巴黎闲逛者(Flaneur)体验不同,行踪不定的主角始终被瞬时感受、过渡和偶然所支配,其观看体验并非充满激情和新奇,反而产生疲倦和恶心,这种消极情感体现着主题面对牢固秩序及“生活之无边际”(Konturenlosigkeit des Lebens)的精神厌恶(Demmerling,2007:95)。

按照德国日耳曼学学者马尔夸特对“日常之暂停状态”(Moratorium des Alltags)的理解,日常中的非常事件是人类主动选择的,对生活方式与秩序的颠覆(参见:Marquard,1989:684ff),齐美尔也在论述大城市现代性体验时指出,冒险行为是个体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激进打断,它使个体脱离出庸俗、平淡的现代日常,以“越界”行为实现都市化体验中自我的审美救赎(Simmel,1911:15ff)。如将《守门员》主角的漫游看作冒险行动,便能梳理出文本的另一重线索:无业游民布洛赫扼死了一同过夜的女电影售票员,此后他读报获知,警方正根据自己留下的线索追踪前来,而荒诞的是,尽管屡次寻衅滋事、招来警察,布洛赫却始终未落网。在无目的的漫游中,被追捕的行动者同时也试图以语言追寻意义,这种双重意义上的追踪最终落空,主人公的三重身份——守门员、安装工和杀人犯——在漫游中逐一丧失。布洛赫杀人后从大都市逃往南部边境乡镇,尽管环境完全不同,但他在两地的交际对象(女售票员Gerda与女租赁人Herta)名字同韵,这一细节暗示了主体逸出日常的必然失败。在文末的罚点球场景中,原地不动的守门员机械地抱住射入怀中的足球,观众布洛赫对此预测错误,这位前守门员借此完成了对自我的外视角审视:重寻自我的漫游或归乡之旅(Heimkehr)注定无果,因为早在启程前,他就只能是“曾经的”守门员,最初的身份已不可追溯。布洛赫逃离日常的尝试终告失败,看似主动选择的冒险死循环无法使他挣脱摆布、获得救赎。如果再延伸,约瑟夫·布洛赫的荒谬处境还可被理解成宗教意义上人类总体的宿命:《守门员》的循环叙事结构在七天内展开,如结合其他细节、从宗教角度展开文本阐释,失业者布洛赫的漫游成为人被逐出伊甸园后的尘世苦旅之象征——而这种解读视域下的主人公形象同样与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互文关联。

2 交流失效:所指缺失的普遍语言模式

《守门员》包含了传统犯罪小说的典型元素,但汉德克称其创作刻意背离该体裁的叙事模式,文本的重点并非谋杀与追捕,而是主人公布洛赫的语言行为和个体感受。题目“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明示了文本重心在于守门员作为主体的感受而非点球胜负结果,“目送球滚过门线”的守门员可被类比作交流失败的主体:防守一方的守门员处于被动,在射手踢出球前他无法作任何判断,只能根据经验和逻辑做出猜测,如此被动状态同样体现在人际交流中试图从另一方获得信息的对话者身上。主角布洛赫在试图通过语言与外界产生联系的过程中一再受挫,造成交流障碍的并非其对话者,而更多在于交流途径本身:语言作为交流媒介普遍通行的性质使日常中的言说主体遭遇了去个人化的处境。

表述布洛赫得知被解雇这一事件的从句(dass er entlassen sei.)是不肯定事实的德语第一虚拟时态,诸如此类的理解失败贯穿文本始末,主人公的激情杀人是语言交流失败的典型案例:电影售票员将票交给布洛赫,她无言而熟练的动作被布洛赫理解成了二人间某种独立于语言交流的默契,但在一起过夜后,他的幻想被女孩随意抛出的日常问题所否定。布洛赫被激怒,并非只因对方提及了他的失业状态:“让他烦心的是,他所说的话,他都能毫无拘束地——这是他的印象——使用”,“他想要回答她的问题,但却停住不说了,因为他认为他想说的都是她知道的”(Handke, 1976:20)。在此意义上激情杀人不单是布洛赫精神分裂症的爆发,而更多在于他寻求的一种私人化语言受到了亲密对话者的侵入。主体的消极处境同样反映在另一起死亡事件中:小镇上有个哑巴学生失踪,在郊外漫游的布洛赫无意间发现尸体,隐瞒了消息的他却故意将学生的自行车推回镇上,这一举动与他逃亡途中留下痕迹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宪兵未能依循线索找到尸体,小镇居民对失踪事件态度淡漠,哑巴学生被遗忘的结局与交流中四处碰壁、始终未被理解和捕获的布洛赫形成了同构关系。

报纸和画刊等信息载体构成布洛赫日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交流无能的他在阅读中暂时消除了受迫,“画报页面和外界不停变化的画面之间的反差让他觉得轻松”(Handke, 1976: 16),与人际交流的双向互动不同,语言在上述信息载体中固定成文字,不信任对话的“阅读癖”患者布洛赫试图以语言命名细节的方式抵抗其感知到的、日常中的纷杂细节,并以为日常之物标价的做法建构起普遍有效的秩序,这些尝试逐一失败;除此以外,布洛赫还试图借助具体物件来承载和传递信息,而这些日常物件的一般抽象性同样使得交流难以达成,这在情节中最典型地体现在警方对他的追踪失败:布洛赫逃亡途中将美国硬币遗失在公交车上,结合他数次滋事、招惹警察的举动,这可被看作故意留下线索,尽管如此他并未落网,原因在于追踪者无法在这一普遍而无特征的能指符号与布洛赫之间建立关联。作为文本中最后一位出场的警官,边境稽查员在与布洛赫的直接对话中描述了追逃行动的不可能性:其对峙罪犯时的身体与心理状态与布洛赫回忆自己作为面对点球手时的无力感完全一致,这个无法达成交流的语言主体最终只能作为无身份的主体“逍遥”法外。

随着情节展开,交际障碍现象逐渐跨出个体,成为所有人物罹患的通病:售货员无法理解完整的句子,女乘客对话反应迟钝,租赁人将布洛赫的笑话当真,上述种种语言沟通失败于此不再仅仅归咎于布洛赫,而是源自普遍意义上的语言异化。文本临近尾声时布洛赫来到一所学校,废弃无人的教室构成对建构语言的知识机构的象征,而校工的自言自语揭示了其衰败:“难怪那些孩子在离开学校时连说话都没有学会呢。……所有孩子其实全都多多少少有语言障碍。”(Handke, 1976:98)作为人类的习得能力之一,语言经由机构被规制成为“通货”,交流中的人如同货币使用者一般满足于价值符号的流通功用,语言内容不再受到追问,语言使用者的个性化表达无法实现;话语框架的僵死和内容空乏最终导向了交流的符号化和物化:文本内不存在任何对体貌特征的细节描绘,原本应在日常交流中鲜活呈现的人物被抽空成发声机器,唯有在使用货币进行付账时布洛赫才能与他人“心照不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公共领域内不可逆转的日常交流失败进行了文学演绎。

3 “空房”隐喻:统辖日常的逻辑语言

布洛赫在绝望的漫游中经历了空间的频繁转换:他自始至终都在途中(Unterwegssein),破碎的家庭隐没在电讯中,而只能在旅店客房中经受“先验的无家可归”。《守门员》中形形色色的房屋构成了主要的感知对象,这些空间不仅仅是被审视和体验的外部世界,同样也是语言系统的喻体:空间的结构压抑、钳制着身处其中的主体,而同样结构化的语言从空间隐喻的背后浮现出来。

文化史学者艾克霍夫认为,房屋可被看作“外化的思想”,是内部形式语言和语法规则的可感性表达(Eickhoff,1997:221),而奥地利文化语境中对建筑、语言与哲学关联的思索也屡见不鲜,例如20世纪初期,受到建筑师路斯(Adolf Loos)影响的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自称在作品中“拆毁报刊的语言外墙”,而维特根斯坦本人更是有过建筑实践(Carr,2007:66f),等等。在汉德克的小说中,离开建筑工地的布洛赫失去了作为安装工的职业,作为将组件(Montagen)进行拼装的工作,“安装工”(Monteur)被赋予使用语言者的象征意涵——拼贴是对语词符号和意义的对应嵌合,他在对外界的感知过程中也不断重复操演着这种动作模式。漫游中的布洛赫在各处空间(如酒馆、电影院、巴士车厢、旅馆客房等)中独处或是遭遇他人,尽管大都会与陌生边区环境殊异,但在平行于现实的语言符号系统中,作为所指的日常之物模糊难辨,固化的语言秩序和对现实的敏锐个体感受之间的巨大断裂造成了布洛赫作为言说主体的无力感。

在凶杀当天早上醒来的布洛赫,发觉自己失去了“想象能力”：“他睁开眼睛,朝放着小灶台的那个墙角看了一会儿:他记住了茶炉和挂在洗碗池边的干花。他几乎还没有闭上眼睛,那些花和那个茶炉就已经想象不出来了”(Handke,1976:18-19)。为了克服这种图片无法还原遗忘,布洛赫首次借助了语言,试图以句子而非单个的字眼组合以帮助想象,但“咄咄逼人”的环境及其中物件所对应的语词暴露出布洛赫语言解释的苍白无力。尽管此时身处亲密伴侣的私人空间,言说主体仍感受到语言与日常事务之间的疏离,无法从中获得熟悉感、被感觉不断追剿的布洛赫此后的杀人行动便早有预兆。

随后,当布洛赫杀人后逃往边境、在某个旅馆房间内独处时,“恶心感”从房屋陈设的背景中向他袭来:

他身下的床垫已经陷了下去,柜子和五斗橱远远地靠在墙边,他头上的天花板高得让他难以忍受。在这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外面的过道里,特别是街上万籁俱寂,布洛赫再也忍受不住了。……他看到屋子里的墙上有两根水管;它们是平行的,上面的界限是天花板,下面的界限是地板。所有他看到的一切都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划定了界限。恶心让他再也站不起来了,让他缩成一团。他觉得似乎自己被一台千斤顶从他看到的一切东西中顶开了,或者是,他四周的物件都从他身上顶起来。(Handke,1976:85)

房屋陈设代表的高度固化秩序占据了空间,以致布洛赫马上感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平衡”:主体与对象、语言表达与感受之间的并行与隔离被具象化为空间内的“界限”,表现为被周身环境孤立的人物对日常事务的陌生感,尽管布洛赫尚身处空间之内。在此前分析中读者注意到主人公的想象无力,这里则体现出主体被客观秩序束缚时无法挣脱的感受,因为秩序早已在符号与所指两个层面的平行结构中造就了“平衡”。

当文本临近尾声时,布洛赫在去运动场之前,经过一座空房屋并向内窥看,这个房屋隐喻使他认识到语言“空洞无人”的本质:

他站在一栋新建的房屋前,那里还没有住人,但是已经安上了窗玻璃。里面的房间空空的,透过窗户都可以看到午后的风景。布洛赫觉得,好像是他造了这栋房子。他自己装了插座,甚至还装上了窗玻璃。就连窗台上的凿子、点心纸和小吃都是他的。……看样子,仿佛他身边一扇虚掩的窗户被打开了似的。所有可以想到的,所有可以看到的都被占用。不是一声叫喊让他感到恐惧,而是一个被颠倒的句子,他出现在一连串平平常常的句子的末尾。他觉得一切都被改了名字。(Handke,1976:91)

海德格尔称“语言是存在之家”(Sprache ist das Haus des Seins),语言出现和形成过程如同房屋修建,其中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替代。然而布洛赫在此面对的是无人居住的房屋,透明的玻璃实际上阻止了他的进入。在前文布洛赫身处室内的情节中,描写都是从空间内部展开,而作为内容贫乏的语言的使用者他难

以认识到这一特征;只有站在空房屋的窗外,他才以外部视角洞悉了无内容这一人工语言的本质结构——“理由”“结果”“目的”等逻辑框架成了语言建筑仅余的残垣断壁,而布洛赫在言说和感受时始终无法挣脱语法规则的束缚,只得跟从“句子的末尾”。面对语言与感觉的尖锐对立,布洛赫试图在言说中获得“解释”,他希望借助语言达到一种真实性诉求(Wahrheitsanspruch),这正是逻辑语言借助命题而试图抵达的最终目的。在汉德克笔下,建筑隐喻着人类理性与知识所希求的、先定而非自决的语言系统,以无内容的空洞逻辑结构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意义”就此隐遁,符号与现实所指、与人的实存从一开始就隐含分裂之虞。此时如果回顾文本首句,读者便可重识这个“克莱斯特式开头”的意涵:“安装工”的句法地位相当于间接宾语,布洛赫作为受通知的当事人占据的不是被动句主语,而是无关紧要的第三格成分,早在此句的语义层面及语法结构中,人物被意义摆布、解读无力的境地都已得到暗示。从工地自我流放的布洛赫从此丧失了自由建构语言的可能性,主体只能走进修缮完毕的房屋,使用凝固成型的语言,这也与第一部分对主人公身份丧失的解读相互呼应。

4 结语

随着“六八”运动后反叛文学退潮,取而代之的是“新主体性”创作趋势进入视域,一度被忽略的个体体验和意识重新回到文学创作者的思想中心,人物的日常生活由此成为典型表现主题,作者的内向性反思也在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展开。作于1972年《无欲的悲歌》被视为汉德克第一部“新主体性”风格的作品(Anz,2015:313),但在此之前,汉德克就已经在第三人称视角的《守门员》中开始了在日常背景下反思抽象语言问题的尝试,小说通过质疑导致人际交流失败的逻辑语言,对语言这一符号系统展开批判:封闭的语言系统完全平行地游离于现实之外,仅仅起到模仿图示的镜面效果,汉德克也以图形符号串的颠覆形式(Handke,1976:105)指出了这一点。主人公布洛赫始终在尝试从对话交流中获得“解释”,但都以误解和失败告终:日常中无处不在的语言使用模式将他的身体行迹与思维活动推向地理和社会交往的边缘地带,他只能被动地等待射手将点球踢出,并在大众化的语言规范面前感到无力。

作为汉德克创作理念从先锋语言实验走向非形而上“拯救式书写”的转折之作,《守门员》人物的焦虑与卡夫卡笔下人物孤立无助的情状具有相似性。作为言说主体的布洛赫漫游于现代城市和乡村,他在交流中无法获知意义,身为罪犯却无法被追踪令他不安,逸出现代日常的冒险之旅由此成为没有出口的折返跑。结尾“罚球手将球踢到守门员的手里”的讽刺意味在于,在逻辑语言这一人工系统媒介的影响下,主体从日常人际交流中获取信息、达成沟通的情况完全受到偶然性所支配,普遍意义上的交流失败则不可避免。是交流危机的理论前提,在以逻辑为单一导向、追求真值性的语言体系这一普遍交流媒介的影响下,人物在公共领域内的日常语言实践中即使依赖情境和经验,也同样无法克服沟通障碍。

尽管汉德克本人否认创作中的语言批判观念受到同胞维特根斯坦影响,然而在《守门员》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二人在语言观上相近的思想轨迹:早期的维氏认为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懂得语言逻辑(维特根斯坦,1996:41),他以简单物的命名为逻辑前提,指出解释的真值性问题成为逻辑语言得以实现的关键;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对《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人工逻辑语言构想自我否定,强调“用法即意义”,通过对语言日常使用的勘查,即可治疗因不当使用而强加给人的理智疾病“哲学病”。由此,对语言的日常使用及效果的探索引起了更密切的学术关注,如J·奥斯汀提出的“普通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概念等。围绕抽象逻辑建构、具有严格真实性诉求的语言真理观植根于柏拉图以降的欧陆哲学与文化传统,在汉德克笔下则成为批判的矛头所指,《守门员》的语言批判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展开,日常之物在文本中既是言说主体的存在基础,又具有深刻的隐喻意涵,汉德克不仅将矛头直向作为能指系统的逻辑语言,更是语言的普适工具性导致的交流失败,与维氏后期的“语言金钱观”构想相比,汉德克的反思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意蕴,日常中的细枝末节不可在言说中被把握,却成为感知的直接来源,并在70年代后汉德克的内向性创作中得到展演。

参考文献:

- Anz, Thomas. 2015. *Marcel Reich-Ranicki. Meine deutsche Literatur seit 1945*[M]. München.
- Ariès, Philippe. 1991. Zu einer Geschichte des privaten Lebens [G]//Aries, Philippe u. Duby, Georges (Hg.). *Geschichte des privaten Lebens* (Bd. 3). Frankfurt/M.
- Barth, Markus. 1998. *Lebenskunst im Alltag. Analyse der Werke von Peter Handke, Thomas Bernhard und Brigitte Kronauer*[M]. Wiesbaden.
- Bohrer, Karl Heinz. 1979. Wo hören und sehen vergeht [G]//Scharang, Michael (Hg.). *Über Peter Handke*. Frankfurt/M.
- Carr, Gilbert J. 2007. *The 'Habsburg Myth', Ornament und Metaphor: Adolf Loos, Karl Kraus und Robert Musil*[J]. In: *Austrian Studies*, Vol. 15. Austrian satire and other essays.
- Demmerling, Christoph u. Landweer, Hilge. 2007. *Ekel*[G] // Demmerling, Christoph u. Landweer, Hilge. *Philosophie der Gefühle. Von Achtung bis Zorn*. Stuttgart.
- Eickhoff, Hajo. 1997. Haus[G] // Wulf, Christoph (Hg.). *Vom Menschen. Handbuch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 Weinheim und Basel.
- Simmel, Georg. 1911. *Philosophische Kultur*[M]. Leipzig.
- Handke, Peter. 1976. *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M]. Frankfurt/M.
- Jung, Werner. 1994. *Schauerhaftes Banales*[M]. Über Alltag und Literatur[M]. Opladen.
- Marquard, Odo. 1989. Moratorium des Alltags—Eine kleine Philosophie des Festes[G] // Haug, Walter u. Warning, Rainer (Hg.). *Das Fest*. München.
- 彼得·汉德克. 2012.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M]. 张世胜,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路·维特根斯坦. 1996. 逻辑哲学论[M]. 贺少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路·维特根斯坦. 2001.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冯亚琳. 1999. 语言危机与人的异化——评彼得·汉特克的小说《罚点球时守门员的恐惧》[J]. *当代外国文学*(3): 166-171.
- 李明明. 2007. 感知的变迁——对感知问题的文化学探讨[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 张赞. 2014. 在旅行中寻找生存的可能——论彼得·汉德克小说中的空间建构[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

On the Theme of Language Criticism in Peter Handke's *The Goalie's Anxiety at the Penalty Kick*

XU Jianhua

Abstract: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2019 was awarded to Peter Handke “for an influential work that with linguistic ingenuity has explored the periphery and the specificity of human experience.” This Austrian contemporary writer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language criticism in his early plays (Sprechstücke), and since the 1970s, “daily life” (Alltag)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axis of his writing. The short novel “Goalkeeper’s Anxiety in Penalty”, which appeared in 1970, could be criticized a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in his transition period of poetry, this anti-detective novel demonstrates the passive state of subject’s actions and feelings in the background of daily life; the protagonist Bloch, as a modern rover, tries to escape from the city of Vienna by adventure and find his identity; However, he was never able to reach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Bloch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 logical view of truth, which prevailed above daily life, and the flow of uncharacteristic languages led to the inevitable failure of communication. Daily life here becomes the object of criticism and some daily things such as architecture become metaphor for logical language. Compared with Wittgenstein’s emphasis on everyday language functions, Handke’s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language in his writing has much richer and profounder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Peter Handke; language scheme; daily life; communication; Wittgenstein

责任编辑:肖谊